

欺瞒、消失和“知觉后勤”的再演绎

——保罗·维利里奥论海湾战争

郑兴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导论

战争是保罗·维利里奥著作中的关键议题之一，他的第一部专著《地堡考古学》即是对于军事问题的考察，此后，对战争的观察贯穿于保罗·维利里奥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几乎所有关键的著作之中。在这之中，特别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维利里奥以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界，指出海湾战争标志着人类数千年来战争史的新纪元。因而，他在《沙漠屏障》(*L'Écran du désert*)这一著作中对海湾战争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当代战争”做出专门的论述。本文即拟通过分析他的论述，结合他对于战争问题的其它相关阐释，总结他在这场战争之中窥见的当代战争中的诸多“新变”，并通过与鲍德里亚《海湾战争不曾发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的比较，来呈现出维利里奥自身战争论述的特点。

一、“电子战”：知觉后勤的武器

早在1984年的《战争与电影》(*Guerre et cinéma*)中，维利里奥就已经预言，相比于传统的“后勤”中的对装备和物资的组织 and 供应，“知觉”的后勤将在今天的战争中更加举足轻重。“知觉”的后勤一方面指通过种种视听产品的供应来更为有效地动员士兵和民众，另一方面指，通过种种先进的技术手段，更快速、更全面地获取战场信息，实际上也就是让己方的军事领导层和作战人员更好地“看见”战场的方方面面。维利里奥指出，在当代战争中，已经不是武器的摧毁能力之大小来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反而是，谁对于战场的信息的获取越快速、越全面，谁能在“信息”层面的“后勤”中掌握绝对优势，谁就立于不败之地。1991年的海湾战争已经完美地印证了维利里奥的预言。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总体战争”(guerre totale)的诞生，海湾战争的爆发则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中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战”(guerre électronique)的诞生，在这一战争中，“知觉后勤”彻底支配了战争的走向。人们在震惊之中看到，美军的先进的信息技术让伊拉克还没有正面遭逢己方主力部队时就已战败。种种先进的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成为战争舞台上最为炫目的主角，而真正意义上的“地面战争”竟然仅仅维持了几天时间，成了整场战争中的无关紧要的附属品，一次例行公事般的“文后附言”(le post-scriptum)。^①

新的信息技术，具体来看，是隐性战斗机、精确制导导弹等各个各种先进的武器和设施，它们所以不同于以往的武器，并不在于它能造成多么强大的摧毁和杀伤，而是在于它们在“信息”层面的、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几乎是匪夷所思种种能力：隐形战斗机能够让自己不被敌人的电子侦测设备所捕捉，“战斧”巡航导弹能够自己识别并且绕过敌人设置的种种障碍，“无人机”能够不需要人员投入就侦查到敌

^①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144.

人战场上的信息，“夜视仪”能够使得己方的作战单位在夜间也能行动。种种先进武器的所带来的“后勤学”优势，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信息供应的全面和准确，美军已经几乎做到对战场形势的无所不见和无所不知，空间的阻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限制都无法阻隔这一上帝般的全面而精准视野；二是信息供应和传递的速度极快。在速度的层面，这场战争抵达了新的高度，成为“实时”的战争。以往的战争中，因为军事指挥部和前线之间、以及不同作战单位之间的空间间隔，在信息的传递和作战的指挥上，难免会存在着“时延”。距离越远，完成信息搜集和反馈的时间越长，但是现在已经是一种“即时性速度”，卫星、侦察机等战争装置都可以以电子方式瞬间将搜集到的图片、视频和编码信息直接传递到五角大楼指挥部的电脑中，也同时瞬间传递到各个作战单位之间。^①战争组织的时空结构的甚至因之而改变：以前的战争的中心指挥部需要设在战场附近，以便保证信息能更快地传达，现在，由于瞬时性速度，可以把指挥部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

维利里奥指出，当时第一次投入实战中的卫星在后勤学优势中占据了关键地位：一方面，卫星在外太空的分布，已经导致了一种“全景式大规模光学视野”的形成，这使得最大程度的“看”成为可能：预警卫星为美军搜集了大量的伊拉克战场的情报；导航卫星使得美军即便在沙漠的恶劣天气中也得准确获取任何一个移动物体的定位。因此，无论是何种“先进的”的飞机、坦克还是导弹，都无法离开卫星的支持；另一方面，后勤学层面的“实时”正是因为卫星而达成。通讯卫星更加使得作战单位之间实现“实时”的互联，带来了当时美军全新的军事指挥系统——“C3i 系统”，^②种种新型武器都依赖于这一系统作为其真正的“大脑”。在海湾战争中的“C3i 系统”是美军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指挥室，它使得己方的武装力量，从最高级的指挥层到最前线的士兵，可以随时保持极为迅捷的联系。^③

也正是因为认识到新型战争中维持信息后勤优势的重要性，美军对敌人实施打击时，其首要的目标不是杀伤敌人的军事人员，也不是摧毁坦克、飞机等攻击性的武器装备，而是更加看重破坏敌人的信息后勤学能力，因为敌方的作战组织也同样严重依赖于后勤学维度的支撑：一方面，美军采取让敌人“信息不足”或者“信息缺失”的策略，此即精准破坏的策略，也就是让战斗机经过卫星技术的指引，准确地获取敌人的通讯设施的位置，对其加以直接轰炸和摧毁；另一方面，美军还采取让敌人“信息过量”，即“欺诈策略”，通过一些强力的信号发射器，在伊拉克战场的上空故意制造大量的己方的“虚假信息”或者无关信息，敌人的电子装置即便捕到己方的信息，但因为大量无关的信息和真实信息混杂在一起，难以从中区分，敌方的分析和判断因此极大程度地受到了干扰。

因此，美军一方面通过自己先进的技术能力确立了息层面的后勤学层面的后勤学优势，另一方面，更加要通过种种手段让敌人在后勤学层面陷入瘫痪和混乱，己方的后勤学层面的优势因此更加能够凸显。这一手段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利好是，敌方的作战组织陷入混乱，而己方的作战更具有针对性，作战时间大大缩短，人员的伤亡远远小于以往的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海湾战争中，美军所消耗的“时间”更多是在“后勤学”层面：美军和盟军用了五个月时间“沙漠之盾”行动完成前期的信息搜集和物资和装备的后勤准备，其后 40 天时间的“沙漠风暴”行动

^①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65.

^② 所谓的 C3i 系统，即“Control, Command, Communication, Intelligence”系统，意谓“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一般也称指挥综合自动化系统。

^③ Paul Virilio,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New York : Semiotext(e), p.35.

的首要目标是致力于破坏敌人的控制、指挥和通讯系统，反而是真正的地面作战时间只用了100个小时。^①可以说，在伊拉克的一方还没有见到美军的部队时，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而这一失败更多的是一种后勤学层面、也即技术层面的失败。

“后勤学”的优势不单单意味着技术层面的便利——更快更好地获取战场信息，其实早在《地堡考古学》、《战争与电影》等更早的著作中，维利里奥即已经指出，“后勤学”还极大地影响着战争参与者的心理。当伊拉克战场成了美军的电子武器的大型“秀场”，先进的作战武器给敌人、给己方的士兵乃至给全世界的战争观看者都带来了强烈的“技术震惊”。海湾战争中一个幕场景典型代表了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在战争的后期，几十个伊拉克士兵居然集体向一架空中飞行的美军的无人机投降。^②维利里奥所推崇的中国兵家始祖孙武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恰恰被美军的先进技术优势达成了。我们在此之中见证了当代“战争兵器”性质的转变，即战争兵器的通讯能力在重要性上已经远远超过其自身的摧毁能力。在战争史中，首先占据主导地位的“武器”模式是“障碍武器”（les armes d'obstruction），也即城墙、壁垒、碉堡等防御工事；工业化时代到来后，攻防对决的形势又发生了演变，火炮、枪械、坦克等“摧毁武器”（les armes de destruction）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今天，“信息战”时代的新式的“通讯武器”（les armes de communication），甚至让敌人在采取任何正式的行动之前就已经陷入了瘫痪，数据传输的瞬间速度、已经发射物的制导和航行的极端准确度，将会彻底淘汰传统武器的所谓的爆炸能力和摧毁能力。^③

推而广之，随着“通讯武器”的越发重要，今后，所谓的“军事威慑”也完全有了不同的内涵。在以前的战争中，要“威慑”敌人，就得诉诸于“强力”的威慑。二战时期，因为原子弹威力巨大，可以瞬间毁灭一个城市，拥有原子弹这样的核武器也即意味着的能吓阻任何潜在敌人，也就可以奠定一个国家的军事上的强势地位。但是，这样的威慑在今天已经不再奏效。武器杀伤力的大小不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所谓的威力最大的武器，比如原子弹和氢弹，在今天的语境下实际运用的空间极小。在当代，最重要的威慑已经是“后勤学”层面的威慑。比如，美国就会通过自己的尖端武器，告诉任何一个潜在的敌人——你始终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只要我愿意，几秒钟之内，就可以精确地打击到你。这样的威慑，才最能震慑到敌人。^④

当种种尖端的技术在今天的战争中占据支配地位，维利里奥认为，这其实蕴藏着一个被我们所忽略的巨大风险：战争的爆发将更加处于不可控的危险境地。这是因为，当新的技术、尤其是自动化技术在战争中占据支配地位，“政治”将不再具有介入的功用。曾几何时，政治充当了冲突的仲裁者和协调者，很多时候，正是因为政治的参与，战争得以避免。然而，政治原本所具有的协调和斡旋作用在今天很可能彻底丧失，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或者民主需要建立在对话和论证的基础上，它需要“时间距离”去反思、去讨论、去作出决断，战争的决断也同样如此。但是，当今，种种武器和技术装置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深度耦合的关联和相互间的极速互动，构成一种自反应的一体化系统，“危机”一旦稍有苗头出现，就会呈现出“决断的自动化”和“毁灭的瞬间化”，一系列的自动化的连锁反应会瞬间

^①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171.

^②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162.

^③ Ibid.,p.18.

^④ Ibid.,p.18.

被触发，它将直接绕过政治决断的过程，直接将自身推向一触即发的战争境地。^①

今天，技术钳制了政治，我们将不再有战争的“政治决断”，而只会有战争的“电子决断”。再伟大的政治人物、再怎么富有智慧的政治讨论，都将很难发挥作用，因为“自动化”已经排除了政治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中，这种倾向已经出现。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核战一触即发，若非两大阵营的首脑当机立断，重建了政治谈判的通道，整个世界有可能在瞬间毁灭。同样，在美国实施“星球大战”计划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也对里根说：“如果你们美国继续将整个计划实施下去，你和我作为总统，作为政治首脑，将丧失作为最高领袖作出战争决策的最终权力，丧失宣战的权力和管理战争的权力。你和我都将不能对任何对手的进攻做出应对。我们的权力将在卫星的自动传导的手中。”今天，技术系统将以其瞬间的自动化反应替代政治决策者做出选择。专家系统 (système-experts) 成为一种绝对的“机械降神” (deus ex machina)。^②我们将不再拥有政治，而只有一种“跨政治”(trans-politique)。跨政治，其实就是政治的消失。因为在“实时”的战争中，我们将不再拥有政治可以介入的“时间”。此类政治不掌握在人类手上，不掌握在政治领袖的手上，而掌握在运算机器和应答机器手上，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时代，他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考虑一下，但是，在里根和安德罗波夫的手上，可能就只能剩下几分钟的考虑时间。^③因此，我们可以说，种种“技术”无论如何发展，绝对不会带来冲突的减少，也绝对不会带来可以预期的和平。

二、电视直播：“兵马未动，影像先行”

海湾战争不单单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战”，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卫星电视面向全世界不间断直播的战争。

电视屏幕上呈现战争场面并非自海湾战争开始。实际上，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观众就已经可以通过电视节目观看越南战场上的影像片段。残酷的战场画面给美国观众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激起了国内的反战情绪，使当时的美国政府背负了巨大压力，这也是美国从越南撤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彼时家庭电视才普及不久，便已经开始展现了对于公众意见、对于政治决策的影响。“影像的政治”此后不断开始显现自身的重要功用，任何从事军事行动、政治行动的个人和群体也开始有了这样的意识，即必须有意地让自身的任何行动和影像、尤其是和电视媒介相配合。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日本的极左翼政治群体在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就开始主动地用录像机和磁带录音机记录自己的行动细节，以便让这些影像随后被电视机播送出去，进而最大程度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69 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是如此，数十万的美青年涌入当地，借助于拍摄机器，他们既是表演的观看者，更借助于那场大规模的聚会，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那场表演的一部分，他们是“表演-观看者”(acteurs-spectateurs)。此后，几乎所有的激进分子都会尝试将自己的政治行动和电视机、和拍摄机器联系起来，都要试图去制作自己的“影像”，去用影像介入政治。^④同样，因为充分吸收了越南战争中的教训，美国的政界和军界已然了解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在“海湾战争”爆

^① Paul Virilio, *Pure War*, Los Angeles : Semiotext(e), p.43.

^②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73.

^③ Paul Virilio, *Pure War*, Los Angeles : Semiotext(e), p.72.

^④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99.

发时，在军事层面之外，他们必须最大程度地对大众媒介也施加自己的影响。

为了充分实现这一目标，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必须主动介入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媒介主导权的掌控和实际发生战斗的战场的掌控一样重要。如维利里奥所说，今天，地缘意义上的战场已经被多媒体的视觉战场所取代。以往我们会提到“海、陆、空、”这三条战线、三个战场，今天，战争中还存在“第四战线”——信息战线。它不单是指作战双方不断在武器中寻求信息层面的技术革新，也是指，作战双方既要争夺地理区域，还要去争夺这个大众媒介这一“屏幕战场”，以便恰到好处地利用大众媒介对公众施加影响，以更好地配合自身的军事行动。^①因此，对于“屏幕战场”的争夺，对于战争双方来说，都极为重要，他们都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对大众媒介施加影响。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虽然自称媒介自由，他们却深知，一旦民众意见被大众媒介支配，极有可能在政治和军事层面带来不可控的影响，因此，他们会以种种隐蔽的方式控制媒介。比如，法国的皮纳德尔将军主导的信息监控体系，随时监控恐怖主义行为在大众媒介中的播放；维斯特莫兰也在美国推行针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检查制度。从入侵巴拿马到海湾战争，对于媒介的控制成为美军最高指挥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事，CNN 虽然号称是独立媒体，但其实是受到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CIA）的严密监控的。^②

但是，维利里奥指出，海湾战争的电视播送相比于越南战争却有着语境的变化，因为电视的发展史上，真正革命性的变化，是因为卫星技术的成熟和投入使用。1964年，美国的超级富翁霍华德·修斯（Howard Hughes）旗下的公司开发出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并成功将其发射，随后，在1980年，美国的CNN租下了其中的5颗卫星，用于电视直播，这才真正地开启了电视的新纪元——24小时电视直播的时代开始了。因此，存在的变化是，其一，在越南战争中，因为技术和其它现实条件的局限，电视中播送的战争影像仍然是需要电视台后期制作与加工的，而且是有一定“延迟”的，但是，在海湾战争中，卫星电视直播的技术已经成熟，因此，在电视上呈现出的，是“实时”的战争场景，而且是覆盖了战争所有阶段的、以24小时直播的形式放送。其二，越南战争的影像片段主要面向的只是美国民众，当时其它国家的民众当时并无可能从电视中见证这场战争。但是在海湾战争中，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民众，包括伊拉克民众，都可以通过电视观看这场战争的“现场直播”。可以说，海湾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真正第一次做到，战场上正在如火如荼地交火，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的人们坐在床上或者沙发上注视着战争的进行。^③

电视节目的实时直播，相比于延迟播送，或者文字新闻，区分极大。任何自重的新闻写作都会需要“写后的时间”、需要一些“延迟”去核实信息来源，而在直播中，是没有这种时间的。^④因此，与形诸文字的报道、与延后播送的报道相比，电视直播改变了新闻的“时间性”。如果说，电视延迟转播的越南战争还是一场“影像战争”，配合着电视直播的海湾战争已经是一种“光波战争”，一种让传导抵达了光速的战争，战争场景都以“现场实时报道”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⑤以往报道是存在着滞后时间的，至少为阅读者、观看者还留下了“反思”（réflexion）

^① 此处维利里奥的观点源自他与学者 James Der Derian 的一篇访谈，该访谈未收入法文版《沙漠屏障》之中，而是补收于后出版的英文版《荒漠屏障》，见 James Der Derian, Paul Virilio, *Virilio Looks Back and Sees the Future*, in Paul Virilio, *Desert Screen*, trans. Michael Degener, London: Continuum, 2002, p.136.

^② Paul Virilio, *Un paysage d'événements*, Paris : Galilée, 1996, p.63.

^③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85.

^④ *Ibid.*, p.107.

^⑤ *Ibid.*, p.94.

所需要的“时间距离”，但是，在电视直播的语境下，观众彻底与事件、与战争中的场景同步，他们没有了“时间距离”，因而没有了“反思”，而更多的是一种“反射”（*réflexe*），种情绪化的即时反应。更重要的是，曾几何时，不同地区的观众面对影像的“反思”也可能各个不同，但在海湾战争中，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伊拉克的观众，他们分享的是同一个来自 CNN 的电视直播画面，全球的观众世纪上都被拉到了同一个战争现场，在他们面前播放的，就是同一个“好莱坞战争大片”，全球的观众虽有文化、种族和地区的差异，在这样的实时播送面前，种种的个人性的背景区隔都消融了，他们都成了同一个类型的“观众”而只会有同一种轨道上的“反应”，一种共同的“情绪反应”，一种“情绪的同步化”（*synchronisation des émotions*）。^①

这一新变将促使“影像的政治”进入新的阶段。面对着直播电视的新语境，面对着全球观众的目光，美国必须采取新的策略，即不能一味地阻止影像的传播以求减少负面影响，而恰恰要能充分领会直播电视的新特质，通过自身的隐秘控制，与其达成完美的合流，反倒可以巧妙地令其为己所用。战争期间，美国总统时时刻刻关注着电视频道，因为他和五角大楼主要是依赖于 CNN 去给伊拉克民众、给全世界观众传递不同的信息。在此期间，美国通过自己的管控，让战争的“直播”具有了“选择性”，尽量更多地让直播电视播送自身的正面形象。CNN 这样的美国电视媒体在持续播送海湾战争影像时，竭力营造这样的印象：这场战争就像一个祛除痛疽的温和手术，我们将以最小的“痛苦”——即最小伤亡人数——为代价达成最佳效果。我们将会制造最小的破坏。同样，我们将会让这场战场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我们将会在新科技的使用中充分体现对战士生命的保护和珍视。这完美地强化了战争的必要性所在，也同时打造了美国的正义形象。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就在同一时期，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坠毁，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电视新闻却只给了这个事件一分钟的片段。但是如果美军士兵有一个死亡，将会有连篇累牍的报道。^②这样厚此薄彼的时间分配，充分暴露了美国的电视台为配合政府宣传而采用的修辞策略。如维利里奥所说，海湾战争中，真正的干预性力量其实是电视，是泰德·特纳领导的 CNN。在以往，如中国的兵家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今天，则完全是“兵马未动，影像先行”。只有先做好电视图像的部署，军事力量的部署、政治外交的沟通才能事半功倍。^③

因为要适应新的“直播”时代，美军这样的政治/军事主体不单单是要介入到媒介的管理之中，同时也需要主动调整自身的种种行动，以适应实时传播的需要。面对着电视的“实时直播”，任何试图把自己的政治/军事行动和媒介结合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单单要有“媒介意识”，即认识到媒介对于行动的重要影响，更要有“时间意识”，要认识到在 24 小时“实时”播送的电视环境下，不可能“事后”再去修改影像再延迟播送，他们必须得精准计算采取行动的“时间”，去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刻”去采取行动，从而让最大程度地让自己的行动配合电视媒体的宣传，达成自己心目中所预期的“效果”。^④基于此种新的电视语境，当代的政治/军事行动必须预设某种程度的“表演性”，因为美国需要让自己的军事行动需要主动去配合媒介，在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之前，不单单是要预估行动的种种可能的政治/军事“后果”，更要将行动经由实时直播的带来的种种可能的“效果”提前考虑在内，甚至可以为

^① Paul Virilio, *L'Accident originel*, Paris : Galilée, 2005 p.52

^②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115.

^③ Ibid., p. 37.

^④ Paul Virilio, *Pure War*, Los Angeles : Semiotext(e), p.212.

了更好的“效果”而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行动。当然，在每次“行动”之前，最优的选择就是，如果能够提前把“剧本”编好，然后让行动按照既定的剧本呈现，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最佳的直播效果，而不是让行动成为一场“即兴演出”，被种种不可测的风险所掣肘。

因此，当代的实时媒介的语境下，维利里奥认为，一种“政治编剧学”(*dramaturgie politique*)势在必行，即为了在电视直播中呈现一场“完美演出”，行动主体必须将“时间”、“情节”、“演员”和“地点”等种种要素事先考虑周全，安排妥当。比如说，美军在海湾战争及此后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必须时时考虑到最大程度地避免己方士兵和敌方平民的伤亡，并因此而针对性地提前筹划自己自身的军事行动，以适应这一目标。战争必然会成为一场“预演”的战争。这样当然不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更加是考虑到“伤亡数字”在电视直播中的舆论效应。不过，这样一种源于实时直播的“政治编剧学”策略不单单是被美军所采用，它在20世纪末期以后，同样被军事斗争中的弱势方、少数派政治势力和恐怖分子狡黠地洞察，他们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开辟“第四战场”，去弥补自身在正面军事战场上的劣势，并将其更加发挥到了极致。最为典型的当然就是“911事件”，恐怖分子非常精准地在电视新闻的黄金时段这一时间点针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他们知道，无论在美国还是欧洲，电视媒体会对任何“意外”加以连篇累牍的报道，因而，他们可以通过公众恐慌的加深和弥漫，给西方政府施加压力，也达到了宣传自己的目的。CNN等电视媒体在袭击发生后，立即实时播送了袭击画面。正因为有了媒介这“第四战线”，恐怖主义才有了他们的用武之地，大众媒介的曝光正中恐怖分子的下怀，他们发动袭击的政治目的就因此达到了。^①如此种种，正如维利里奥所说，一切已经在那里(*déjà là*)，已经被看到(*déjà vu*)，甚至可能已经被预演(*déjà joué*)。^②

在改变了“影像政治”之外，电视“实时播送”的战争还使电视机前的观众忽略了“电视战争”所带来的伦理风险，^③因为观众彻底被“直播”所造就的“伪-真实性”所蒙蔽。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本身，和正在被高清直播的事件的虚拟视像之间，后者在重要性上已经取代了前者。本真性伦理在这里产生了混淆和颠倒。然而，我们通过电视屏幕去间接地“看”，和通过自己的裸眼去直接地“看”以及和自己去在场感受，完全不同。在电视中的新闻现场，当伊拉克的某个城市的角落被因为美军的炮轰而发生了爆炸，借助于高清晰的屏幕和高保真的音响，电视前的我们，仿佛真地置身于爆炸现场了，甚至于借助电视和音响，我们甚至还能够获得比现场的人更多声音和图像的“细节”。我们也就丧失了获得“在场感受”的欲望，我们不再需要“在现场”了，只要让我们自己置身于“虚拟现场”即可。可是，坐在沙发上喝着可乐、吃着薯片且注视着高清屏幕的战争的远程观众，他们获得的这样一种所谓“现场感”，真的会和在现场的伊拉克平民的感受一样吗？也即，卫星电视直播以其所声称的高清晰度的、实时的“直播”，制造了一种“真实幻觉”，篡改了、取消了战争中的“在地性”的真实残酷。因此，电视的高清直播图像构成了一个过滤机制，把战争真实的残酷的一面跟观众隔离开来。

在维利里奥的现象学视野下，以在场的身体为中心的获取的丰富的生命感受，是任何的电子媒介无可取代的。就这一点而言，维利里奥对电视战争的点评甚至比齐泽克更犀利。齐泽克说过，电子媒介提供给我们一种“剥夺了抵抗性坚硬内

^① Paul Virilio, *Un paysage d'événements*, Paris : Galilée, 1996, p.53.

^②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43.

^③ Ibid., p.93.

核的“实在” (the Real divested of resisting hard kernel), 它就像是广告中的“无咖啡因的咖啡”, “无脂肪的奶酪”, 已经帮我们剥离了所有的麻烦和风险, 我们只需尽情享用它的令人愉悦的一面。举例来说, 远程网络所提供的虚拟性爱, 以及海湾战争中的所谓“无伤亡战争”的电视宣传, 正是如此。经过了电视屏幕的转换后, “海湾战争”成了一场“干净之恶”, 所有的事情都是许可的, 作为观众, 可以尽情享用眼前的视像。^①但是, 齐泽克这里所说的“剥离”, 更多的指的是, 电视屏幕对于播送的内容是有“选择性”的, 其中刻意减少了破坏性的、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内容。维利里奥却要说, 即便电视屏幕上大量呈现破坏、伤亡和流血的场景, 我们也同样会成为电视装置的“牺牲品”, 因为屏幕所呈现的“残酷”和经由“在地”的身体所感受到的“残酷”绝对是不同的, 前者的内涵要远远比后者更为丰富。我们被“欺骗”, 并不只是在于内容的差异, 而是在于我们的在场的身体感受, 被技术装置替换了。维利里奥提醒我们, 万万不可把其中的角色颠倒了: 作为战争的电视观众, 我们不是无辜的实验室助手, 只是通过远程视看, 士兵成为显微镜下的待分析的微生物。我们更不可把自己的罪感和良心蒙蔽了, 我们所分享的不是无辜, 而是罪恶。^②

三、“有”“无”之争: 战争中的“消失美学”

海湾战争还为我们呈现出一场维利里奥的“消失的美学”这一重要概念在战争领域的极端演绎。

“消失的美学”本是维利里奥从电影艺术中总结出的概念, 他指出, 传统的艺术是一种“浮现的美学”, 比如绘画和雕塑, 无论艺术家意欲呈现出何种图像和图形, 始终都存在着一个固定的物质根基, 以此作为自身的依托: 绘画依托画板, 雕塑依托石头等等, 正是首先有了这样一种一以贯之的稳定的物质根基, 艺术家所创造出的艺术形象慢慢地“浮现”出来, 并且此后便跟这个物质根基之间形成稳定的结合。电影则是一种“消失的美学”, 因为电影中的艺术形象和内容之所以能够被构建出来, 不是建立在一个稳定的物质根基之上, 而是必须有赖于每一帧图像都以极快的速度被放映, 随之便形于消失。只有每一帧图像都处于“消失”的过程中, 电影才能够存在。^③“消失的美学”除了可以概括电影这样的新媒体艺术之外, 更加可以用来指称在当代社会越发常见的以去物质化、以消失为根基的种种现象: 比如, 当代建筑越发崇尚“更少即更好”原则, 崇尚对物质性的消灭, 法国南部的“米约大桥”就是典范。^④

现代战争中的“消失的美学”同样开始趋于普遍, 其中的一种“消失”是作战的士兵身体的“消失”。在古典的战争中, 人的身体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首先, 人的身体首先可以提供一种动力学价值, 军队的行军和转移主要还是依靠战士的双脚。再者, 双方的交战需要的是身体与身体间的近距离接触, 因此, 在古典的战斗里, 人们通过各种装备和制服, 最大化的突出战士身体, 凸显其可见性, 试图使其如同舞台上的光彩夺目的主角。但是, 随着战争的机械化和远程化的程度不断提升, 凸显自身的身体、凸显己方装备和物资的“躯体”即意味着暴露自己于地方的远程武器的攻击范围之下, 显然极不明智, 自此以后, 现代的战斗, 必须

^① Slavoj Žižek, *How to Read Lacan*, New York: W.W.Norton, 2006, p.38.

^②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111.

^③ Paul Virilio, *Virilio Live*, London : Sage, 2001, p.33..

^④ Paul Virilio, *L'Art à perte de vue*, Paris : Galilée, 2005, p.52.

反转自身身体的视觉策略，即不能在战场上凸显自身的身体，而是要通过迷彩制服、种种装备和军事载具的掩护，使得自己的真实身体被最大化地遮盖起来，被掩藏起来，使其形于“消失”。海湾战争中，在美军这一方，种种新的军事载具——装甲车、坦克、飞机——显然可以让士兵的身体完全无需暴露在外，完全隐藏于机械装置之中。

这种“消失”不单单意味着战士的自身身体的趋于“不可见”，更加意味着，身体在现代战争中的趋于“无用”化。这一趋势在海湾战争中走向了顶峰。在装备了种种信息化武器、远程武器和机械装甲之后，美军的士兵真正意义上可以做到，既不需要暴露自己的身体，也根本不需要见到伊拉克的士兵和装备，因为电子屏幕上只要显示了对方的影像，己方的自动化武器就已经将导弹发射出去，顷刻之间对方已经被摧毁。这意味着身体在战争中不再能提供任何动力学价值，也不再能提供搏杀的价值，连针对身体的直接化知觉在战争中也不再必要。战士们的身体消失了，与身体相关的的知觉功能也都不再需要了，一切已经由军事卫星和各种遥感设备的“间接知觉”去代为视看、代为聆听。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肉身与肉身的战争，需要近距离与敌人接触，机械化时代，敌人虽然不和己方直接接触，最起码还会出现在己方的视野里，在信息化时代，战争既不需要见到对方敌人的真身，也不需要运用己方的身体和知觉，士兵们坐在屏幕前按一下按钮，已经把敌人消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战争，已经无异于一场“电子游戏”。(Desert Screen 92) ①

维利里奥指出，战士身体趋于“无用”，身体在军事设备逐步复杂化和自动化进程中，成为战争机器的无足轻重的附属物，这是军事层面的“无产化”，它堪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工人被资本主义大工业所强加的经济层面的“无产化”相比拟。这样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战士们被解放，反而意味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支配关系，因为战士的身体彻底屈服于自动化的战争机器面前，成为战争过程中的无足轻重的附属物。当战士们的身体“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军事载具和技术义肢之中，士兵们会出现一种事关自身身体的心理危机，也即出现一种被“去物质化”(déréalisé)和被“去现实化”(dématérialisé)的“脱节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士兵们的“真实感”丧失了，当一切可见的目标失去了感性的指涉，他们将感到自己处于无限的虚空与崩溃之中。②自动化的战争机器剥夺了战士们的身体承认，他们的身体被“去社会化”(désocialisé)，也被“去动物性”(désanimalisé)。每个战士都成了战士中的无名者(soldat inconnu)，他们不再是战争中的“主人”，而成了战争中的“服务”者。曾几何时，战士会将自己视同为狮子或者老鹰，现在，他的身体只是意味着一个幻影(fantôme)，或者说，战士尸骨堆前的一块裹尸布而已(suaire avant l'ossuary)。③

海湾战争中的“消失的美学”不但事关美军士兵的自身身体的消失，更加事关敌方士兵身体的“消失”：当美军的战士们都置身于军事载具之中，他们的眼睛几乎见不到伊拉克士兵的真实身体，后者只被转换成一个个的电子符号出现在电子屏幕之上。对方身体的“消失”将带来一场伦理疑难：“我”扣动了武器的扳机或者按下了按钮，敌人倒下，但是整个过程中对方士兵的真实身体都不在“我”的“直接知觉”的范围内，那么，这是否还算是“我”将“他”杀死？当“我”的动作和“他”的死亡之间不再在“我”的肉眼知觉之中建立起联系，当战争机器将这二者彻底隔离开

①

② Paul Virilio, *Guerre et cinéma*, Paris: Etoile, p.19.

③ Paul Virilio, *L'Horizon négatif*, Paris : Galilée, 1984, p.108.

来,杀戮的罪感还会存在吗?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论述在这里可作为补充。鲍曼指出,战争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杀戮问题以及于此相关的道德负担,但是,现代性技术和武器的成就使得战争中的对象“越来越远”,敌人“不可见”了,也即杀戮的主体和对象被隔绝了。而道德是与视觉法则紧密相连的。当对象靠近眼睛,它就庞大而厚实,随着距离增大,对他人的责任就开始萎缩,对象的道德层面就显得模糊不清。直到最终对象与道德负担从视野中双双消失(With the growth of distanc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 shrivels, moral dimensions of the object blur, till both reach the vanishing point and disappear from view)。当你对着屏幕上的某个点扣动扳机,你很难想象,自己是不是真的杀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很难会有“杀人”所带来的原始的道德困扰。也即,战场上的道德冲动被现代武器压制到最低点,而这是因为源自,现代武器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距离的生产”(production of distance),从而彻底让对象逸出你的视野之外,使你更加顺畅地在战争中执行上级的命令。^①

正是因为杀死对方士兵和平民的罪感被现代武器很大程度地消解了,战争中的“伤亡”的概念也就被偷偷地置换:当美国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凸显,美国开始鼓吹自己战争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所谓的“零死亡战争”。但是,维利里奥指出,“零死亡”这一表达的背后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悖谬。因为就是在美军使用所谓“零伤亡”这一概念时,在鼓吹这些所谓新技术对士兵的保护时,从来就是指的是己方士兵的“零伤亡”,这一逻辑默认了,战争造成的伊拉克的平民和士兵的死亡不需要被考虑在内。诚然所谓的“高科技”战争是使美军士兵的伤亡降低到极小数字甚至真的做到没有伤亡,但是,谁曾考虑对方的平民和士兵的死亡?难道己方士兵的生命和敌方士兵的生命之间存在着等级高低?难道战争可以做到连对方的士兵和平民也可以不受损害?维利里奥在此指出,受害者的性质出现了奇怪的倒置,冲突的伤亡者都是平民百姓,军队人员却以需要保护物种的姿态出现,这对这场以“人道之名”发动的战争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讽刺。^②正因此,美军种种新的武器被维利里奥称为“纯粹武器”(d'armes pures)。“纯粹武器”正是“纯粹战争”在当代的具体表现。“二战”以后的“纯粹战争”(guerre pure)给现代人以一种错觉,即认为当代已经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冲突,我们已经迎来了和平,然而,战争阴影其实并没有消失,也正是因为新式武器在海湾战争中使得美军人员伤亡数字极少,我们同样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武器的进步可以令“战争无害”。这种给人带来无害错觉的所谓新式武器就是“纯粹武器”。但是,即便是美国如何宣传新式武器和所谓的“高科技战争”、“零伤亡战争”,战争的残酷本质并没有改变。^③

在现代战争中还存在着“军事装置”的消失。如维利里奥在早期著作中所阐释的,军事装置的“消失”(disparition),或者说,其“消失的美学”(esthétique de la disparition),主要指的是军事设备和载具在迷彩、外壳的伪装下,或者利用周边环境的掩蔽,或者通过自身的高速移动,目的就是让敌人的眼睛很难辨别这个设备和武器的位置所在。但是,在海湾战争中,在新的电子战争的语境下,此种传统意义上的“消失”,即“军事装置自身的消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了。值得关注的、也真正决定今日战争之走向的,是海湾战争中出现的另一种新的“消失”,此即美军的“军事装置之再现的消失”。因为,今日,无论是敌方还是己方,“知觉后勤”不再依靠人的眼睛,一切有赖于机器:卫星、无人机、雷达等等,

^①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Holocaust*, Cambridge: Polity, 1989, p.192.

^②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Galilée, 1991, p.115.

^③ Paul Virilio, *Un paysage d'événements*, Paris: Galilée, 1996, p.61.

而此类机器在完成“侦查”之后，所传递到战士面前的、传递到军事指挥层眼前的，只是军事目标的“电磁图像”，并且借助于“屏幕”呈现出来。战争中的“看”这一行为已经分裂为两种类型，就像是飞机的座舱向我们展示的情形：一种“看”是用裸眼去看，飞行员抬头就可以透过飞机前部的挡风玻璃，往机身之外视看，另一个“看”是，飞行员低头就可以看到的显示屏，所有的重要的信息都已经转换成电子图像和数据显现在上面。这两种“看”，一种是直接知觉（*perception immédiate*），一种是间接知觉（*perception médiatisée*），而“间接知觉”在重要性上已经远远超过了“直接知觉”，可以说，战争的光学首先是一种“电子光学”（*électro-optique*）。^①当代战争中，所谓军事“伪装”，所主要针对已经不是敌人的眼睛，而是敌人的侦查机器。在当代“知觉后勤”之含义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战争中要做到让自己“不被看见”，更加是意味着，是让自己的“图像”不被呈现于敌方的屏幕之上，而不是让自己的“本来的身体”——无论是士兵的身体还是机器的躯体——被敌人的“眼睛”看到。

如维利里奥所说，最能典型代表这种新型“消失美学”的就是 F-117 战斗机。F-117 战斗机之所以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并不在于它有多么强大的摧毁能力，也不在于它飞行速度有多迅速，相比于 F-16 和 F-18，它甚至速度更慢，操作性更差，也没有携带更多的炸药，而是在于它的“隐形”能力。但这种“隐形”，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自己的军队人员或者物资的“隐藏”或者“伪装”，今日战争中的“隐藏”，已经悄然发生了性质转变。要注意的是，F-117 掩藏的并不是自身的“真实身体”，飞机就在那里，甚至肉眼都可见到，它隐藏的只是自己的“远程图形”。从建造之初，它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图像”不要在敌人的雷达屏幕上出现。相比于传统的致力于制造破坏、制造杀伤的武器，相比于传统的军事“伪装”，它完全处于在另一个层面。人们向 F-117 所要求的，是一种“电磁消失”。如维利里奥所说，以 F-117 为代表，此类新的军事机器存在于两种“真实”（*real*）之间：一种是“实在的即现”（*présentation actuelle*），飞机“在那里”，机身连肉眼都可见到；还有一种是“虚拟的再现”（*représentation virtuelle*），飞机“不在那里”，但它在雷达显示屏上出现。军事机器的设计者就是要不惜代价地消灭它的“再现”，也就通过取消雷达信号的反射面，使它前期任何行动的轨迹都无可捕捉，就像一个人的反射形象不可以在镜子里被呈现。这一切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它最终只有唯一的一次“即现”，那就是它采取攻击的那最终一刻。飞机在“现身”之前就已经悄然出发，直到它出现之前，敌人都无法追寻它的电磁图像，等他们看到飞机现身，一切已经太迟——飞机已经在向他们开火。^②

四、“真假之辨”：作为参照的鲍德里亚

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后，除了《沙漠屏障》，维利里奥的好友鲍德里亚也曾以《海湾战争未曾发生》一书谈论这场战争。欧陆的理论家中，以文字对这场战争做出了正面回应的，当以这二者最为知名。如果我们对比维利里奥和鲍德里亚的论述，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讨论既有很多相通之处，也存在着重大的区分。因此，如果我们能在本文对此加以一番对比，特别是通过对比较这些“相似”中的“相异”的对比，以及追究这一“相异”的根源所在，将加有利于我们理解这场战争，

^① Paul Virilio, *L'Écran du désert*, Paris : Galilée, 1991, p.90.

^② *Ibid.*, p.42.

也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两位当代的法国哲学家。

首先，维利里奥和鲍德里亚都认为，对武器的展示和促进未来的军火销售，是这场战争的的隐秘目的。

对维利里奥来说，“海湾战争”就是一个不断试验种种最新武器的实验场，是“星球大战”计划的种种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美国将不间断地迫切需要这样的试验机会，因为它既可以完美地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尖端武器的威慑力，更加为此后的全球军火生意做了一次兜售的广告。这种广告，必须借助于电视直播才能完美实现。因此，在海湾战争给的电视直播中，展现新技术和新武器的场景会特别得到突出。海湾战争就是一场纯粹实验的冲突，一个推销技术的战争，观众成为“五角大楼-资本主义”的理想搭档，而在这场冲突中的主要目标其实是让美国超越它的那些欧洲的和日本的竞争对手，从而在军火市场，尤其是通讯武器的军火市场上，获利更多。伊拉克不过就是一个虚假的敌人（*Desert Screen* 105）。^①维利里奥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他眼中，“军事工业集合体”已经支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他认为，虽然世界大战早就结束，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集合体”的性质从未改变：我们今天的多数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我们的平民阶层所创造的财富，大部分并没有用来为平民的日常生活、为“民事”的福祉服务，而更多地是为“军事”的需要服务，为研发保障自身绝对军事优势的种种“武器”服务。投入巨额资金研发军事装备、不断地发展军事经济是今日资本主义世界的必然发展路径。

鲍德里亚则指出，海湾战争是一场“过剩”的战争，一场用来减少或者清除“存货”的战争——无论是武器的存货还是物资的存货，一方面用来“清仓”与“抛售”，另一方面用来展示未来的新的军事装备。因此，这源于美国高度发达的经济和工业在经过了长期稳定的发展滞后，积累了过量的“剩余物”，因此，在这些过量的“存货”统统变成垃圾之前，美国有必要发动一场奢侈的战争。鲍德里亚之所这么认为，却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理论背景。他深受乔治·巴塔耶的影响。巴塔耶认为，我们不应以孤立的眼光、或者以封闭的模型去研究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而应该以更为总体的视野——即“普遍经济学”——对其加以考察。在这种视野下，地球表面所能给人给予地球上的生命体的生存空间（生物圈空间）是有限的，既定的有限空间和人类蓬勃旺盛的扩张生命的需要实际上存在着矛盾，人类的生产 and 生存只能局限在这固定的空间之内，但却不可能实现无限制的增长。一方面，人类通过太阳的赠予和自身的活动获取、积累生命增长所需要的能量，但是，另一方面，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下，特别是工业化时代以来，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制造出的可支配能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维持和繁衍生命的需要。在现存空间已经开拓殆尽的情况下，人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能量”。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这样的“剩余”就越多。如果这些剩余能量不能被一种非生产性的、非功用性的活动——也即巴塔耶所说的“奢华”或者“浪费”——所消耗，就会产生风险：即这些剩余能量就不但不再能够支持人类生命的发展，反而会窒息生命。

在剩余物过度积压的情况下，人类会倾向于以“奢华”，去“浪费”一部分过剩的能量，为进一步的发展腾出空间。在所有的“奢华”的形式中，战争是最具消耗能力，因为它同时达成了巨量的生命体的消耗和巨量财富的消耗（*Bataille Works* 195）。因此，人类历史上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每次经过一段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之后，往往都会发动战争。同样，正是经由这一“普遍经济学”的视野，鲍德里亚才会认为，“海湾战争”实际上就是美国在“越战”以后经历了数十年稳定发展

^①

的势所必行：它已经积累了巨量的“剩余”，不但对其自身而言，甚至对全球范围内而言，都成了一种窒息的负担（波 40）。因此，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消耗掉一部分自身的“剩余能量”极有必要，可以为它自己未来的进一步发展留下空间。在“海湾战争”中，美国不能大量“消耗”士兵的身体，但他们可以毫不保留地挥霍财富——即大量使用各种昂贵的武器、设备和物资，完成一次彻底的“消尽”。

再者，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鲍德里亚坚定地否认这场战争的“真实存在”，而维利里奥的立场则与他相反。

如《海湾战争不曾发生》这一书的标题所表明的，鲍德里亚的主张显然地有悖于我们的常识，这也是此书引起极大争议的原因。不过，我们不能从日常语言的层面去理解他的这一论断。因为这其中牵涉到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定义“战争”？鲍德里亚说，他所指的“战争不曾发生”，并不是指美国及其欧盟盟友的军队没有去过伊拉克，而是他基本上就认为，就算美军真的去了中东，但在那里发生过的“军事行为”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预定了美国会赢的结局，因为巨大的技术优势，伊拉克人连丝毫的作战的机会都不会有，他们这一方已经提前宣告失败了。此外，真正的战争，是需要一种双方真实的、破坏性的对决关系，也就是说，它需要双方的“真实接触”，也即真正意义上的正面对决，但是，这场战争中大部分情况下，美军都在依赖高新技术，他们根本不会和敌人的真实身体发生正面冲突，甚至连“见”都不会见到，敌人只是电脑屏幕上的一个标靶。鲍德里亚举例说，这就像是“网络性爱”一样，没有真实身体接触的性，还能被称为“性”吗，同样，没有真实正面冲突的“战争”，如何能称为一场战争呢？（《波》 75）

鲍德里亚之所以这么认为，还与他自身对当代社会的“拟像”（*simulacrum*）演变的判断是有着根本的关系的。他认为，“拟像”分为三种秩序：一个是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建立在自然性模仿（*imitation*）基础上的仿制（*counterfeit*），对应着某个真实存在的自热物。第二种是工业革命以后的机械化批量复制（*duplication*）所带来的“制造”（*production*），虽然可以没有原初的对应物，但是仍然是和现实世界（*the reality*）之间有着实在的关联；第三种秩序即是今日时代的“拟真”（*simulation*），它不过是一种“无本源之真实”（*real without origin*）的模型（*model*），因此，“拟真”中只存在“非真实”之间的不断相互指涉（*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①迪士尼就是“拟真”的典范。迪士尼乐园是照着华特·迪士尼的动画建立出来的，是先有了虚拟的动画，然后才有了现实中的公园，人们当然知道，迪士尼动画是纯粹的想象之物，但是，更有趣的是，迪士尼在自己的领地里——比如“美国小镇大街”，给人们提供了整个美国的“微缩版本”，人们在里面可以找到所有美国特色建筑的迪士尼变体，但是，其中的秘密在于，迪士尼是要通过自身的“假”，试图去印证乐园外面的世界是“真实的”，游客相信：迪士尼是“假”的，但是洛杉矶是真实的，美国也是真实的。然而，实际上，美国和洛杉矶恰恰也都不是“真实的”，整个美国就是一个“超-真实”国家——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模仿的先例、也没有真实指涉对象的国家，人们所居住的那个的现实美国不过就是一个大号版本的“迪士尼”而已。建立迪士尼乐园这样的“幻想之地”，就是为了掩盖这样一种“事实”（*fact*）——“真实之物”其实不是“真实的”（*the real is no longer real*）（*Simulacra and Simulation*）。^②同样，海湾战争中，通过电视中不断地制造战争的影像，不断地虚拟战争，就是为了通过战争的想象，让人们相信，那个正在发

①

②

生的战争是“真实的”。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电视上的战争是否“真实反映”还是“歪曲反映”了现实中的战争这个问题，电视上的那个战争，和那个正在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其实都不是“真实的”。

鲍德里亚还补充说，其实我们所有人也已不再需要“真实”的战争。如维利里奥所说，这是一场被“预演”的战争，鲍德里亚也同样指出了这场战争的“预演”的成分，但他和维利里奥的侧重点并不一样，他认为，在开启这场战事之前，这场战事的每个程序都已经预先模拟了无数遍，美军已经把“剧本”写好，而真实的战斗的每个环节都不会脱离这样的剧本之外。这场战争已经祛除了所有的不确定性，冷酷而精准的当代战争机器让一切都依照计划好的秩序展开，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也没有任何“激情化”的失序，另一方面，通过五个月在海湾地区集结兵力，一场冗长的延宕早就让观众产生了无数期待和想象，更加通过电视新闻连篇累牍的报道，战争也已经在我们的想象中“预演”了无数遍。这场所谓的战争就像一场冗长的“脱衣舞”，它完全依照预先设置好的程序依次升级“脱衣”的步骤，让情色慢慢逼近最高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观众，经由脑中预设的对即将呈现的裸体的色情想象，支撑着我们紧跟着“脱”的过程，维持着自己的亢奋，但同时这一过程又不断延宕，让我们观众总是面临着演出的“脱而不尽”，在漫长的等待之中，我们作为观众的想象性期待被不断消耗，以至于当最后真的脱光时，我们其实已经无所谓真实的胴体是什么样了（波 91）。^①因为，鲍德里亚早就指出，在今日的世界中，虚拟先于真实，就像是博尔赫斯的寓言中，先有了地图，而后才有了国界，而非相反。我们先通过电视有了“虚拟”的战争，先有了战争的模拟，才有了后来战争的实施，至于后来的战争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真实存在，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它真实与否其实我们已经不在乎，因为真实的战争还不如电视“虚拟”的战争能够令我们获得更多的“快感”。

因此，就战争的“真假之辩”而言，鲍德里亚和维利里奥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维利里奥通过电视的“假”，提醒我们，那场战争的“真实的”残酷存在于“现场”，只有通过身体的在地体验，才能把握这样的丰富的“真实”，在此之中，体现了维利里奥对于真实原则的坚决捍卫。战争中的新的技术设备，特别是美军面对伊拉克的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使得战争成了一场无需“接触”即告收场的无聊游戏，此种新的“事实”是支撑鲍德里亚否定战争之“真实存在”的重要理由。维利里奥同样也看到了此种事实，只不过，不同于鲍德里亚激进否定战争的“真实存在”，维利里奥显然更愿意将其命名为“消失”，也即如前所述的“消失的美学”，“消失”并不是指“不存在”，而是指它的形态不再依托于一个稳定的物质化根基，它正在经历着由“实”转“虚”的过程。战争中的“无接触”，战争中的“正面冲突”的急遽缩减，是当代战争中出现的新的趋势，即战争将因为技术的革新而开始趋于虚拟化，但这不妨碍它的“真实性”。维利里奥不认为这场战争不存在，而是倾向于认为，我们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关于战争定义的标准，在海湾的战场上，战争是存在的，只是战争的形态已经跟以往发生了根本性差异，而如果仔细梳理人类的战争史，战争形态的根本性变化显然也并不止于这一次（*Desert Screen*）。^②同样，对维利里奥来说，网络性爱在人类技术义肢发展的新语境下，不再是一场“不存在的性爱”（对鲍德里亚来说正是如此），而是正在成为一种即将普遍存在的全新的性爱形态，“无接触”的战场也必然在今后的战争中成为常态。然而，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通过电视影像的“虚假”，我们也只能得出，其实虚假的影像所指涉的，仍是一场“不存

^①

^②

在战争”，而鲍德里亚这样的“虚无化”的指认还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最终彻底走向一个“存在”的黑洞。在此之中，显然已经没有“真实”的容身之处。

结语

海湾战争对维利里奥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现代战争，它完美地演绎了维利里奥的“知觉后勤”的理论，战争中被大规模应用种种的信息技术和卫星技术，标志着“知觉后勤”不再只是当代战争的辅助手段，而是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走向。这场战争还是人类第一次通过电视直播让全球观众实时见证大规模军事行动，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欢呼新闻自由的进步，而只是意味着，美国在发动一种新型战争的同时，也在操作一种新的“影像政治”。我们也看到，新的技术语境下，维利里奥的“消失美学”的概念也在当代战争获得了新的呈现。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引入鲍德里亚对海湾战争的论述，进一步凸显了维利里奥与鲍德里亚二者理论背景的差异，这样的比照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